編者的話

宗座講話並非否定傳教士的歷史價值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今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舉行的「偉大的傳教士和科學家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致詞」，意義深遠。有關教宗的講話全文，詳見本刊今期第六頁。讀者亦請參考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長吳終源神父就教宗講話所作的分享。

在致詞當中，教宗對傳教士過往在中國的傳教過程中有不完善的地方，表示由衷的歉意。教宗的道歉聲明，引來國際上一眾傳播媒介的重視，且更可以說是過份重視，以至於掩蓋了教宗講話的其他部份。

事實上，教宗的道歉，只是整個講話中一個細小的部份而已。教宗講話的重點在於建立友誼。教宗的道歉聲明，應放在他多年以來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促進對話、與不同的社會群體進行修和的框架之下去理解。

更重要的是，教宗的講話以至其中的道歉聲明，並不應視爲對傳教士過往數百年來努力工作的否定。要理解對傳教士工作的評價，我們不妨先退後一步，看看中國大陸上的歷史學家如何給予答案。

對於傳教士的種種看法，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顧裕祿教授在其所撰的「上海天主教史」（收錄於阮仁澤、高振農一九九二年合編的《上海宗教史》一書，編爲第十四至十八章）中的一段話，算是相當持平的說法。顧教授這樣寫道：

每一種有廣大社會影響的宗教，總有著它自己所標榜並有信徒加以實踐的、能獲得人心的「勸善戒惡」的言行。天主教是以「愛」來標榜的宗教。在歐洲天主教歷史上，有人舉辦諸如收養孤兒孤老，救濟窮人，看顧病人等慈善事業，這是事實，不必否定。當然，宗教離不開政治，也常爲統治階級所利用，這也是事實。我國近代史上，西方列強曾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國；有的傳教士不惜爲侵略者效勞。但就來到我國的多數傳教士來說，他們從小生活在教徒佔大多數的西方社會中，他們所受的教育是教會學校的教育。他們選擇做神父、修女的道路，一般是出於宗教虔誠，立志爲宗教而獻身。他們來中國有外國侵略中國的背景，但他們中有些人的主觀動機確是爲了宗教。這些（主觀動機是爲了宗教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把舉辦慈善事業作爲對天主教所主張的「愛」的一種實踐，並作爲傳佈天主教和發展教徒的一項重要方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我們應該尊重歷史，承認這些。

另一位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顧長聲教授，於一九九五年《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一書修訂第三版時，寫出其對傳教士工作的最新看法，摘錄如下：

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方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他們遇到很大的阻力，中西方文化在相遇後發生了長時間的衝突。關於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已有不少中外學者發表過意見。歸根

結底，從中國一方來說，主要是受長期維護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及其政治體制所制約，加以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入侵使國勢日弱，出於民族危機感而不加區別地採取抵制和排斥；從傳教士一方來說，主要是受基督教必欲戰勝異教中國的宗教信念所驅使，挾持著西方科學和技術的優勢，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改造中國。

這兩位在國內備受重視歷史學家，均對天主教傳教士的動機及工作持肯定的態度。在這框架下，我們可以看出教宗在道歉聲明中的牧者心懷，希望連在中國人記憶中最微小的不安，也獲得適當的平息，這才是教宗的原意。

實際上，教宗今次的講話，重點在於「修好」，其基點建立於利瑪竇的名著《論交友》一書之上。從書中的理念出發，教宗強調友誼的重要性，並從而肯定其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的意義。

在講話中，教宗表示「中國人民，尤在是近年來，在社會發展方面為自己定下重要的目標。天主教會讚賞這驚人的希圖和勇敢的創新設計，願意在推進和維護人權、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人的超自然使命各方面，提供深思熟慮的貢獻。」然而，教宗並未沒有忘記提醒我們，不能因為物質進步而忽略社會公義及人類互助等更高層次的價值。教宗說，「教會最關心的，也是對現代中國最為重要的那些價值和目標。就是社會正義、團結互助、和平、對全球化現象的明智處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進步。」

教宗亦強調，中國與天主教會均是現今世上歷史最悠久的群體之一，雙方均擁有超過十

億兒女，因此，教宗「祝望開闢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的空間，希望能藉此克服過去的誤解，進而爲中國人民的福利並爲世界的和平，攜手合作。」

教宗在作結論時特別提到，「今日國際團體極其不安的時刻，要求所有的人共同努力，一起建立及發展民族之間的同情、友好和團結關係。在這樣的形勢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聖座之間關係的正常化無疑地會對人類的前途帶來積極的影響。」在此，教宗明確地指出中梵關係正常化不但是天主教會與中國之間的事，更對全球的福祉有直接的影響。

教宗已經伸出了他的橄欖枝，中國方面如何接收及理解，則要看中國領導層的智慧了。隨著中國積極加入國際舞台，中國社會將日趨成熟及開放。中國領導層如能以同樣開放的心情去處理宗教及文化的融合問題，對中國以至對整個世界，將有百利而無一害。

文化間的融合問題，牽涉到如何促進相互之間的理解，以協助不同文化對當前的處境作出適當的回應，本刊今期所載多篇文章，包括張克祥神父的「修院的培育要與時代和社會相適應」，亞洲主教團協會的「基督徒對儒家及道家的詮釋」，以及柯毅林神父的「中國大陸的基督宗教研究」，均對天主教如何立足於中國文化之中的問題，提供新的視野，各位讀者幸勿錯過。主誕佳期將至，謹祝各位讀者及作者聖誕快樂，主寵常盈。

林瑞琪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